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行走 在历史中

徐蓝自选集

徐蓝 著

XINGZOU ZAI LISHIZHONG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行走的历史中

BEIJING SHEKE MINGJIA WENKU

徐蓝自选集



徐蓝
◎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走在历史中:徐蓝自选集/徐蓝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656-2178-9

I. ①行… II. ①徐… III. ①世界史—研究 IV. ①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50208 号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XINGZOU ZAI LISHIZHONG

行走在历史中

徐蓝自选集

徐 蓝 著

项目统筹:杨林玉 责任编辑:王慕飞
责任设计:王征发 责任印制:何景贤
责任校对:李佳艺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37 插 页 2
字 数 430 千
定 价 8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编委会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玉田 方玄初 石仲泉 史秋秋 李志坚 刘新成
江 平 许 文 吴树青 何卓新 宋贵伦 张文启
陈先达 欧阳中石 金冲及 周一兴 郑必坚 逢先知
袁行霈 顾明远 徐惟诚 陶一凡 陶西平 童庆炳
满运来 戴 逸

编 委 会 主 任 崔耀中 韩 凯

编 委 会 副 主 任 赵 峰 孟春利 刘 颖 梁立新 荣大力 王野霏
杨生平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俊人 王中江 尹 鸿 龙翼飞 叶培贵 白暴力
李 强 刘 伟 孙武权 杨林玉 杨念群 吴国盛
张 际 陈 来 陈平原 陈雨露 赵汀阳 俞 斌
黄天树 黄泰岩 彭 林 韩 震

出版说明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自那一年开始，中国已经走过了波澜壮阔的30年。这是伟大的30年，是改变中国的30年，是震惊世界的30年，也是哲学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30年。

在哲学社会科学这30年的辉煌成就里，浸透着为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奠基的老一辈专家呕心沥血的求索，也镌刻着寻着他们足迹的后来者追求真理的步伐。“学之大者，国之重器”。我们有责任将这些“大者”潜心研究的成果，重新编辑出版以飨读者。为此，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将这一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奉献给读者。它以自选集的体例形式，每年推出一批，争取在几年内达到百种以上。《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系统展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名家学者30年来的学思精华，展示他们的学术探索历程和风采。同时，为使这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更加丰富，编委会决定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已出版的《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中挑选符合体例的图书，编辑成《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纪念辑》，这将更完整地反映北京学人在学术风范和学术使命上的历史延续。

我们相信，《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能够成为具有文化传承价值的经典性大型出版工程，成为集中展示首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成果的一个窗口。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定有不足之处，希望读者和同仁给予批评指正。

编 委 会

2009年11月



徐 蓝 先 生

历史选择 选择历史

我的一些老同学都有些奇怪我为什么会选择了历史专业，因为在她们的印象中，我在高中时一直希望上大学后学习数学，而历史和数学，好像有点“不搭界”。然而这实际上却是一种因中国历史的发展而做出的选择。

有关我上大学的曲折经历，已经在“不为一时之名利 不争一日之短长”一文中讲述，这里不再赘述。但是我在这里仍然希望强调的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人是渺小的，但是个人的命运又是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连在一起的。我赶上了祖国发展的好时代，的确是非常幸运的。

我的大学生活是刻苦而充实的，我希望能够以此稍稍补回一些已经失去近12年的时光。尽管在上大学之前，我已经学过不少历史知识，但是真正系统地学习历史，是从上大学开始的，特别是通过中国史和世界史这两门通史的学习，使我看到了历史长河的浩瀚与深邃，曲折与进步，从而对历史产生了极大的敬畏之感，同时也对历史产生了很大兴趣。然而，在大学期间最大的收获之一，是通过一些名师的教学，我对历史教学与研究有了些许心得。

齐世荣先生的现代国际关系史，以专题讲述，使我第一次接触了

大量外文史料和西方学者的学术观点，对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分析问题，有了一些切实的感受。我也初步认识到，对历史的研究不仅要勾勒通史的发展，还要对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个案深入探讨，而后者正是前者的重要基础和支柱。同时我对史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也有了一些了解，这为我以后研究世界历史打开了一扇门。宁可先生为我们讲了一年的中国古代经济史，他对每一朝代的经济情况的具体讲解以及对整个线索的勾勒，使我初步理解了学习和研究历史的点、线、面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认识到通过史料考证和鉴别进行研究的重要性。戚国淦先生虽然为我们上课不多，但是他讲授的古代日本、越南等国的历史，让我领略了他的深厚学术功底。还有一位徐北海老师，他极富逻辑的讲述和通过大量数学运算来揭示政治经济学中的问题，曾令我很兴奋，直接感到了数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位讲授中国古代哲学史的许蛟老师，我曾惊叹他对马列著作的熟悉程度。还有徐中秀老师讲的世界古代史特别是古代印度史，陈曦文老师讲的世界中世纪史特别是基督教的历史，丁朝弼老师讲的世界近代史特别是对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精彩讲解（当时就博得了我们班同学的情不自禁的热烈掌声），都令我印象深刻、至今不忘。尽管当时外请的教师不多，但是系里请北京大学徐天新老师教我们苏联史，他那平实而富有深刻思考的讲述，对我极有启发；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廖学盛老师给我们讲解的古希腊史研究状况，使我认识到在研究一个具体问题之前梳理前人对该问题的研究状况即学术史的重要性……。总之，通过这些名师的教学，不仅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而且使我对实证研究是历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以及对所研究的问题的学术史的梳理是研究该问题的重要前提等等方面，有了重要

的感性体验。

说起决定主攻世界史，也与国家的发展分不开。我们上大学的年代，正是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随着国人再一次开眼看世界，随着国家对外交往的不断扩大，我对世界史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尤其对世界近现代历史和国际关系史感兴趣。但是真正开始世界史的研究，还是在留校任教之后。

1982年1月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历史系主讲世界近代史。但是由于当时师资比较缺乏，所以我作为本科教学的“主力”之一，在1982~1986年的几年时间内还承担了本校政法系（今政法学院前身之一）的世界近代史，马列教研室（今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前身之一）干部大专班的世界近代史，外语系（今外国语学院前身之一）的世界通史和美、英、法、德、俄（苏）、日、意等大国的历史，以及国际政治学院（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前身，现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团河校区）的世界现代史和世界当代史。尽管这些教学工作占用了我的大量时间，教学内容也远远超出了世界近代史，但是经过几年的教学，我对世界通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和当代史的基本内容有了大体的了解，为我今后的教学和研究打下了比较厚实的基础。后来我研究的一些重要课题，大多是从教学中，从学生的疑问以及与他们探讨中形成的。教学相长，使我终生受益。

断代史和通史的教学，使我注意到了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例如，我对当时的世界通史划分断代的标准产生了困惑。由于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基本上是在苏联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对西方著作的译介也还有限，因此中国的世界通史教学除了一些各校自编的教材之外，最重要最基本的参考书是苏联10卷本《世界通史》（实际上是13卷，我们习惯上仍然称为10卷本），以及由周一良、

吴于廑为总主编的新中国第一部4卷本《世界通史》，即后来人们所说的“周吴本”，及其相对应的4卷资料选辑。这些基本的教科书，主要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人民群众为主角，把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排列起来，分时期按国别地叙述了从人类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而且不包括中国的历史，成为名符其实的外国史。在这样的划分标准指导下，当时的世界近代史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现代史从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结束；1945年以后为世界当代史。但是在实际进行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的教学过程中，就带来了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将英国的一场内战作为世界历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转折点是否合适？如何认识15、16世纪（所谓的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各种社会变化？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的终点和起点是否说得通？十月革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什么关系？战争与革命之间是什么关系？将两次世界大战截然分开的论述是否科学？两次世界大战是否有其内在的连续性？法西斯运动的产生以及西方民主国家对法西斯侵略扩张采取的绥靖政策是否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结果有关？等等。

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我在教学中参考的一些西方学者的著作，如英国学者H. G. 威尔斯的简明世界通史读本《世界史纲》、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相当艰深的《西方的没落》、根据美国学者威廉·兰格主编的《世界史百科全书》翻译的《世界史编年手册》（古代与中世纪、近代、现代3部分），以及根据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的文字部分选译编成

的《世界史便览：公元前 9000 年—公元 1975 年的世界》等重要的通史类参考书以及其他专著，对世界历史的看法和分期显然与国内的主流看法不同。我还注意到中国学术界对世界历史也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吴于廑先生的几篇相互关联的重要论文，即《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①。特别是吴先生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②对“世界历史”这门学科的阐述，对我很有启发。他写道：“我仿佛看到世界史是历史学科中一门有限定意义的分支学科，这门学科的探索目标在于世界由古及今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过程，怎样由原始的、闭塞的、各个分散的人群集体的历史，发展为彼此密切联系的形成一个全局的世界历史。”（见《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不过当时我作为一个初学者，只是觉得这个对“世界历史”学科的定义的提法与过于强调“世界历史上的社会形态演变”的提法有所不同，似乎更强调世界各地的相互联系，但我也只是隐隐约约地感到了它的重要性。

① 分别载自《云南社会科学》，1983(1)，47～57 页、《历史研究》，1984(1)，3～24 页、《内蒙古大学学报》，1985(4)，1～10 页。以后吴先生又陆续发表了《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和《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分别见《世界历史》，1987(2)，1～18 页和 1993(1)，3～20 页。

② 当时吴先生引用的是人民出版社 1972 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112 页和第 1 卷，51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大量的教学工作使我深感自己的知识严重不足，特别是对国际学术界研究状况的了解十分有限，这就激起了我继续学习的热情。首先是学习英语。尽管那时已经有一些翻译成中文的著作，但是如果不能直接阅读英文原著，仍然无法更多地了解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动态和对重要问题的研究成果，也无法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既然我注定要做世界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我就必须学习英语。但我的时间有限，于是我就在自学日语并已经能够用日语阅读专业书籍的同时，在恢复俄语和下决心学习英语之间进行选择，最终决定暂时放弃曾经学过6年、但在10年“文革”中已经荒废了的俄语，从头开始学习英语，以后如有机会再捡起俄语。但是俄语却从此没有捡起来，这也成了我的终生憾事。

当我在34岁开始学习英语时，确有“急功近利”的考虑，即如何能在较短的时间里达到能够阅读专业书籍的水平。在家人的鼓励下，在齐世荣先生和其他老师的帮助下，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我一面参加学校为青年教师开设的每周两次的英语班，从基本的听说和语法学起（“文革”中听过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屠蓓老师在电台教的英语，学会了26个字母的发音和“Long Live Chairman Mao”等等），一面找来一本英文原著，开始一字一句地翻译。虽然现在已经不记得那本书的名称，但还清楚地记得我翻译的那一章的标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刚开始，几乎90%以上的单词都要查字典，几乎每一句话都要在纸上抄写下来分析它的语法结构，所以一天也翻译不完一页。但是我坚信持之以恒、必有收获。凭着我的执着，凭着我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再加上中文的基础较好，一年以后，成效就明显了。

在专业上我也有继续学习的强烈愿望。1979年国家恢复了研究生招生制度，一开始我也想报考日本史的研究生，但家人还是希望我

能够接受完整的本科阶段的教育，于是我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到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又遇到了毕业后是否要继续硕士阶段学习的问题。可是我当时对国际关系史更感兴趣，不想局限于学习一国的历史，但又受到外语的限制，所以我最终放弃了报考研究生，做好了去中学做一名历史教师的准备，并打算自学英语，继续我的爱好。由于毕业后留校任教，这就给了我继续学习的条件。于是我尽可能旁听了世界史研究生的课程，认真完成作业，收获颇多。特别是田农先生教我们如何使用工具书，大大提高了我查找资料的能力。另一方面，我也找到了一个可以深入研究的问题，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与英国的矛盾与对立，作为我学术研究的起点。这就是在齐世荣先生指导下完成并于1985年发表的我的第一篇论文《试论围绕修筑巴格达铁路的德英之争》。

在我真正开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还有三件非常值得提及且必须提及的经历。

第一件事是齐世荣先生布置给我的核查资料的工作。我记得那是在1984年夏天，齐先生为了准备中国代表团参加1985年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也是中国代表团第一次正式出席这个大会）的发言，撰写长篇论文《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希望我核查一些日文资料并做必要的书面翻译。为此整个暑假我几乎每天都待在北海旁边的北京图书馆里，“早八晚八”，借阅了大量日文资料集和专著。正是循着齐先生的研究路径，我初步学会了治史方法，受益无穷。

第二件事是我在职攻读博士学位。1983年，我得知历史系获得了世界近现代史和国际关系史的博士学位授予权，1984年开始招生。可我没有硕士学位，无法报考，不免遗憾。但是第二年教育部就下发

了以同等学力报考博士研究生的文件，其中规定：以同等学力报考博士研究生的考生要有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硕士研究生的学习成绩，而我正符合这些条件。1986年2月，我开始师从齐世荣先生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开始为本科生讲授现代国际关系史，后来又开设了战后国际关系史课程。

齐先生是国内世界现代史和现代国际关系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尤其在绥靖政策的研究方面有开创性的贡献。在他的指导下，我的英文阅读大有进步，开始通过阅读大量原著了解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动态。我发现，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20世纪70年代，国际学术界对30年代英国绥靖政策的研究已经从英国对德国和意大利的绥靖政策扩展到英国对日本的绥靖政策，出版了一些重要专著，其中存在着英国的对日政策是“绥靖政策还是绥靖行动”“是否存在远东慕尼黑”等争论；对该政策形成的原因也从“传统派”向“修正派”发展，即从较为简单地论述张伯伦等人“对凡尔赛条约的罪恶之感”“对希特勒所追求的目标的错觉”以及“避战求和”，转向了依据解密档案研究更为复杂的英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意识形态、民意舆论、英帝国、国际组织等方面，而这些问题，也正是我在教学中遇到的问题。但是国内学术界的研究除了齐先生的几篇重要论文之外，仍然较少涉及这些问题；另一方面，国际学术界关于英国对日本的绥靖政策的研究主要建立在梳理英国方面的原始资料基础之上，相对缺乏日本和中国方面的资料，因而也存在着史料的缺陷。在齐先生的鼓励 and 指导下，我便以20世纪30年代英国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情况下对日本采取的绥靖政策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

在职学习期间，系里减少了我的一些教学工作量，让我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研究。我以英、日、美、中等国的原始资料为基础，借鉴已

有的研究成果，从1931~1941年这10年来围绕日本侵略中国所展开的英日关系中的20多个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入手，逐一进行个案微观考察，最终写成了约35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1989年12月25日，我的论文通过答辩。我还记得答辩委员杨生茂先生因病未能参加我的答辩，但却寄来了他要提的问题，这些问题装在一个密封的信封里，当场拆阅提问，还要在答辩后看看我的回答如何。杨先生的认真与严格，令我既紧张又钦佩。1990年1月我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此后一年，我一边完成紧张的教学任务，一边修改补充我的博士论文。1991年7月，在当时经费相当紧张的情况下，这本40多万字的专著得到了校长出版基金的资助，得以出版。

第三件事是我作为齐世荣先生的助手，参加了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的讨论并撰写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20世纪20年代国际关系的一些内容。1987年，受国家教委（即教育部）委托，吴、齐两位先生开始共同主编新的《世界史》，后来人们就将其称为“吴齐本”。在多次倾听两位总主编循循善诱的讲解和说明以及他们与其他前辈学者特别是分册主编刘家和、王敦书、朱寰、马克垚、王觉非、刘祚昌、彭树智、张象以及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于渊、王方宪等先生的讨论中，我终于理解了这套书的重要性：在阐释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过程中，既要重视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也要重视世界历史的横向联系，也就是说，既要揭示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发展演变而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又要揭示人类历史从各地区之间的相对闭塞到逐渐开放、从彼此相对分散到逐步密切联系，最终发展为息息相关的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客观过程；与此同时，世界历史的这种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之间又是一种相互交叉的互动关系，从

而体现吴于廑先生所给出的关于“世界历史”这门学科的定义：“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①据此编写的世界史，不同于“周吴本”，不仅将中国放入其中，而且在近代史编和现代史编中，以1500年作为世界近代史的起点，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等等。这些在世界通史编写体例方面的重要变化和创新，不仅更符合世界历史的客观发展过程，也解开了我的困惑，初步回答了上述各种疑问，并提供了更多的至今我都希望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1993年吴于廑先生突然遁归道山，并未看到这套书的全部出版，令人唏嘘不已。但是他提出的这种整体的全球世界史观，不仅开创了中国的世界通史编纂的新局面，开拓并发展了中国的世界史学科，而且引发了学术界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新思考和新探索。

在以后的教学与研究中，我继续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并思考相关问题。我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实际上就包括两个方面，即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从纵向看，人类历史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并将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尽管并不是所有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历史都无一例外地按照这个序列向前发展，而是先后不一、形式各

^① 这是吴于廑先生为1990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撰写的“世界历史”条目中的第一段话，该条目也是“吴齐本”教材的总序。

异，但是这个从低级社会向高级社会发展的总过程，仍然具有普遍的、规律性的意义。从横向看，人类的历史是从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逐渐发展为全世界成为一个密切联系的息息相关的整体的过程。在历史的横向发展方面，物质生产的发展仍然是其推动力量。人类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纵向的重大历史现象会对横向发展形成制约，横向发展也会对纵向发展产生反作用。

在我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的过程中，还有两个有所提及但没有展开的研究课题，一个是美国与中日战争的关系，另一个是美国与英国的关系特别是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而后一个课题既涉及政治外交，还涉及军事外交和经济外交以及文化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这也正是当时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前沿。于是在我完成了博士论文的修改后，便决定研究第二个课题。1992年8月～1993年7月，通过学校推荐和美方的选拔，我得到美国亚洲高等教育基督教联合董事会的资助，到美国弗吉尼亚州林奇堡学院(Lynchburg College)作高级访问学者。这给了我收集资料并与美国同行交流的便利条件，我先后到马歇尔图书档案馆(位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内)、美国海军历史研究中心(位于华盛顿海军大院内)、美国国会图书馆、罗斯福图书馆等地查找资料，收获颇多，回国后发表了系列专题论文，并着手撰写专著《走向同盟：1937—1942年的美英关系》。

同时，我继续参加一些重要的世界史的研究项目或教材的编写工作，从中得到了更多的锻炼和提高。1997年，齐世荣先生和廖学盛先生开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九五”规划重大课题《20世纪的历史巨变》的研究工作，分配我撰写1900～1990年的国际关系部分。这个任务是对我的一次挑战，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写过如此需要宏观把握的问题。于是我停下了正在撰写的专著，转到这个课题领域。在